

王安石罢相与陈升之职管江南

——读史谈片话镇江之九十六

□ 习斌



王安石像

继宋仁宗年间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之后，宋神宗年间，王安石主持“熙宁变法”。这次变法又被称为“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的影响，远远超过“庆历新政”。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着手实施变法，当时遭到了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众多大臣的反对。如果不是神宗的极力支持，新法根本不可能推行下去。可是到了后来，神宗在新法的推行上也产生了摇摆。最终王安石罢相，新法陆续废止。及至神宗驾崩，哲宗登基，高太后垂帘听政，新法几乎全被废除。

在王安石变法过程中，也有许多支持者，如陈升之、沈括，都曾以不同的态度，积极支持新法。

陈升之，字咏叔，建州人。据《宋史·陈升之传》记载，王安石主持新法，为了寻求支持者，举荐陈升之出任宰相。陈升之初极力支持王安石变法，后来两人在一些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眼见新法受到很多大臣反对，陈

升之遂托病归卧百余日。神宗几次敦促劝谕，他才回到朝廷。此时适遇母丧，升之去相，回家守孝。

据《京口山水志》记载，陈升之将其母葬于五州山，“升之曾建显慈寺于山中”。元《至顺镇江志》亦云：“显慈寺，在五州山，宋熙宁中建，丞相陈升之守坟院也”。陈升之建显慈寺，是在他后来复还朝中之后。寺内登眺之所曰“日观”，曰“卧云”，系山中绝景。

陈升之在润州建有宅院。据宋《方輿胜览》记载：“升之后居于润，神宗朝拜相。”而据宋《嘉定镇江志》记载，陈升之故宅，“在朱方门外，范公桥之南”，“旧总所中酒库相对，运河东岸侧有秀亭，后废”。由此可见，陈升之故宅位于今天的酒海街附近。陈升之迁居至润州，这应该是在他将母亲葬于五州山的原因。

关于陈升之宅院，沈括写有《陈丞相宅》诗，云：“丞相旌旗久不归，虚堂守止叹伊威。绿槐楼阁山蝉响，青草池塘野燕飞。”陈升之久在朝为官，这座宅院大部分时间系其家人居住。

另据元《至顺镇江志》记载：“陈升之，居丹徒，位至丞相，封秦国公。升之本由进士及第，然以其非兹郡所举，故略而不载。至其子孙，由此乡举而登第者则书之。”由此可见，陈升之迁居润州，应该是他科举进士以后的事情了。陈升之进士及第，在景祐元年(1034)。

熙宁七年(1074)底，陈升之复返朝廷，任枢密使。不久，他因病解职，以同平章事衔出任镇江军节度使、扬州通判，封秦国公。陈升之职管江南的润州和江北的扬州，治所虽在扬州，可因先人墓地位于润州，陈升之遂请于朝，“每岁寒食、十月旦，乞至郡展省”。朝廷同意了她的请求。

据宋王钰《默记》记载，每次陈升之过江扫墓，扬州、润州的地方官员都要穿着官服，在江边送迎，船队浩荡，旌旗飘飘，称得上是“今古一时之盛也”。

此时王安石被罢相，正居于蒋山，即今南京紫金山。尽管一度对变法的看法有所不

同，但这并未影响两人之间的关系，陈升之对王安石的知遇之恩，心存感激。听说王安石大病初愈，陈升之便乘船到蒋山去拜望。此番由水路去蒋山，虽路程不远，但却“舟楫街尾，蔽江而下”。此外，沿途还贴出告示，请百姓注意避行，衙役在船上一路鸣锣喝道。

王安石听说陈升之来拜访自己，便让两名家丁扛着一顶小轿，到江边迎候。陈升之的大船慢慢驶近岸边，衙役还在舟中起劲地吆喝，提醒附近的船只避让。陈升之在船上看见，芦苇丛里，王安石已下轿立于岸边，于是赶紧让船靠岸。大船在江面上回旋了好久，才终于停靠在了岸边。和王安石相见后，陈升之很是羞惭。返程时，他下令衙役不许鸣锣喝道，船队悄悄地返回了扬州。

这则故事尽管不长，但情节丰富而生动，王安石的节俭和陈升之的大讲排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陈升之好排场，慕繁华，从《梦溪笔谈》里的一则记载也能看出：“丞相陈秀公治第于润州，极为阔壮，池馆绵亘数百步。宅成，公已疾甚，惟肩舆一登西楼而已。”陈升之修建的园池楼馆，绵延达一两百丈，规模之大，令人咋舌。宅第建成后，陈升之已病得很严重，只是让人用轿子抬着，登了一回西楼而已。当时人们戏称这宅子有“三不得”：居不得，修不得，卖不得。

陈升之在《送程给事知越州》一诗里，描写了自己老润州的生活：“早年交契最绸缪，垂老江城为少留。濒海新城筑金垒，琐闼初远遽延旒。过家燕坐多宾乐，到郡公余放吏休。满目湖山何处胜，蓬莱高阁正清秋。”这首诗写于熙宁十年(1077)。陈升之的好友程师孟调任越州，赴任经过润州时，陈升之为其饯行，并赠诗一首。在诗里，陈升之已有“壮士暮年”之叹。

陈升之卒于元丰二年(1079)，年六十九。神宗特意辍朝两日，以示悼念。陈升之亦随母葬于五州山。

据《宋史·陈升之传》记载，陈升之被人称为“釜相”，意思是说他善于附会钻营，以此求取富贵。陈升之虽是“熙宁变法”的早期

参与者，可后来和王安石的关系变得若即若离。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这未免不是明哲保身的办法。

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曾被二度罢相。第一次是熙宁七年四月，第二次是熙宁九年(1076)十月。陈升之前往蒋山拜访王安石，应该是其第二次罢相之后。

王安石主持变法伊始，朝中便新旧党争不断，连慈圣太后、宣仁太后，也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神宗最终对变法产生怀疑，王安石遭罢相。

首度罢相后，王安石知江宁府。他曾到润州，拜访赋闲于此的刁约。在《藏春坞诗献刁十四文学士》一诗中，王安石写道：“蒜山东渡得林丘，邂逅篮舆亦少留。今日更知莱氏隐，暮年长忆武陵游。”颇有心灰意冷、退隐田园之意。

次年二月，王安石即被复相。由江宁沿水路赴汴京，途经瓜洲时，他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泊船瓜洲》一诗：“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诗中既表露了他对前途的隐隐担忧，又抒发了对江南的留恋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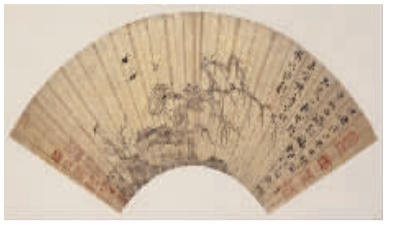
王安石复相，已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得到神宗的支持。朝中新旧党争依旧，短短一年之后，他又被罢相。王安石复居江宁，直到元祐元年(1086)去世，未再出仕。

居江宁期间，王安石和金山寺宝觉和尚颇有来往。王安石与宝觉相识于京师。治平四年(1067)，王安石被召为翰林学士，赴京途中，曾游金山，与宝觉“一宿金山顶”。王安石赋闲江宁后，宝觉从润州前来拜访。听宝觉言及“化城阁甚壮丽，可登眺”，王安石不免“思往游焉”。关于此事，王安石写有《赠宝觉》一诗。

王安石另有《化城阁》一诗，可见受宝觉邀请，王安石曾复到金山寺，畅游化城阁。“荣华一朝尽，土梗空俯偻。人事随转轴，苍茫竟谁主？”登楼远眺，抚今追昔，王安石不免感慨万千，心情难宁。

夏日话扇 纳清凉

□ 黄建如



炎炎夏日，酷热难耐，持扇轻摇，清风徐来。“有风我不动，我动就有风，如果不用我，除非刮秋风”，扇子是古代不可缺少的夏日纳凉用品。

据史料显示，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扇子的国家。扇子，始于尧舜时代。晋人崔豹《古今注》载：“舜作五扇”，明代也有“舜始造扇”的记载，可见扇子在我国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了。

然而，扇子最初的功能并非今日的“生风取凉”，而是为帝王障风蔽日之用。史学有证，最初的扇子长柄缚羽，其名曰“翼”，是由侍者手持替帝王贵族遮尘挡风的“障屏”。而且到了殷周时代，这种遮蔽风尘的“障屏”又一度演变成仪仗的饰物，帝王高官出行，都由这种“障屏”开路，以示其威。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竹编的扇子，并大规模地传入民间，此时人们才开始用以扇风驱热，使扇子的功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确定了扇子生活中的主要地位。千百年来，经过劳动人民的不断创新，制作扇子的工艺越来越多样化。就扇子的形状划分，有圆形、方形、梯形、椭圆形、梅花形等；就扇面划分，有平面和折叠之别；就扇子的用料划分，有竹扇、骨扇、纸扇、蒲扇、葵扇、纨扇、绢扇等。汉代还曾经出现过“机动扇子”，《西京杂记》中记载：“武帝时，长安巧工丁缓作七轮扇，连续七轮，大皆径尺，夏月一人运之，满堂皆寒。”这种扇子算得上是如今电风扇的鼻祖了。

伴随着扇子在生活中的普遍使用，扇子文化也逐渐形成，扇子成为一种艺术载体，古人以在扇面上题诗绘画为乐、为雅：小桥流水、名山大川、花鸟虫草、仕女佳人，以及诗词歌赋，相映生辉，赏心悦目。三国时谋士杨修曾因给曹操画扇，深得青睐。晋朝大书法家王羲之也曾给卖六角竹扇的老妇，在每个竹扇上各写五个字，助其“以求百钱可也”，留下佳话。明代唐伯虎、文徵明、沈周等人都喜在扇面上作画题诗，多传趣闻。清人在扇面作画最为擅长，出现了石涛、八大山人、任伯年、吴昌硕等画扇高手。迄今，有许多史上画扇佳作传于世，如明代周之冕的竹雀扇、唐寅的枯木寒鸦扇、沈周的秋林独步扇，清代恽寿平的菊花扇、王武的梧禽紫蔽扇等，都属国宝级文物。

在我国戏曲史上，有许多故事情节也与扇子有关。如《西游记》《红楼梦》《包公案》等；还有许多就是以扇子为戏名的，如《桃花扇》《买花扇》《檀香扇》等。如今，扇子还是评弹、曲艺、戏曲、舞蹈等演出的道具。戏曲中的扇子功，可说是戏坛一绝，昆曲、京剧、蒲剧、川剧等许多剧目中都有运用扇子的技巧，各具特色。京剧中的生、旦、净、丑各行角色皆有此功，其中以小生、花旦等使用最多，技巧更为丰富。演员通过挥、转、托、夹、合、扑、抖、抛等动作的组合，配合身段，可以衍化出各种姿态，以表现人物的情绪，刻画人物的性格。

由于扇子受到不同身份与爱好的人选用，因此，从古到今，民间便产生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歌谣和扇谜，俯拾皆是：“打开半个月亮，收起袖内可藏；来时石榴花开，去时菊花开放”“有朵花、不常开，半截纸、半截柴，严冬它在柜中放，盛夏无风手中载”“合起像把尺，展开如半月；人家笑它冷，它笑人家热”……这些谜语生动形象、朴素自然，富有生活情趣。

丹徒李氏昭王洵后裔源流考

□ 周福全

丹徒李氏始祖源流开沙

唐宋时期已形成的开沙，是一片冲积沙洲，幅员辽阔，土地肥沃，人烟稀少，吸引了大批宋室南渡人员迁居开沙。据明崇祯三年李蔚纂《开沙志》记：开沙，古时以丹徒、京口、润州等名著称，原是镇江城北长江中最大，最古老的沙洲，包括开沙、藤料沙两大沙洲，西起焦山江滩，东至团山脚下，宽达30-40华里，长达60余华里。至明清时期，由于长江江湖肆虐，冲积沉淀的沙洲，地基松软，堤岸经受不住江水昼夜浸泡、冲刷，常年坍江不断。经古水文专家测定，长江水道流经江段呈90°转弯时，河床不稳定，江中沙洲也不断坍塌，开沙故址也最终淹没江中。

上海图书馆馆藏了一部1917年续修的《丹徒李氏家乘》，其中记载：宋室南渡，丹徒李氏宗室源自徽州白岳(今属黄山市歙县、祁门县)，迁至润州开沙，历世至凤，时逢沙洲坍塌，支祖凤公，字鸣岐，又迁城北九里街。由于三世高祖天一公以族事株连，家财罄尽，饮恨过世。四世曾祖仰桥公发愤起家，始相宅在城东的梳儿巷，后又定居于城南的下河头。时至明万历年间，家业日日兴隆，家族有修谱打算，仰桥公立马召集五世祖敬敷公、五世叔祖春华公、瑞生公，立高祖凤公为始祖，始分三宗，另建支祠，别修宗谱，自为一族。顺治十六年(1659)年，李氏避海寇，从城内迁居南乡四区赤溪、乱平，瑞生公一宗返宅与仰桥公居城南下河头故居。敬敷公一宗则再迁至三区之西丘陵的仁里村。春华公一宗则留旧地。李氏三宗，后因战乱再迁扬州、苏州、湖北、上海、南京、北京等地。

另据1925年李锡纯等修《开沙李氏宗谱》记载，今江苏丹徒县开沙之李氏，出自唐宣宗第九子昭王洵。在唐末，先迁新安(今安徽黄山市)，再迁祁门(今黄山市祁门县)。传至宋代太二公，由祁门迁居到江苏丹徒之开沙，为开沙始祖。开沙李氏后因江湖肆虐，开沙故

址难存，而各迁他处，有迁润城(今属镇江市)、扬城(今属扬州市)、顺江洲(今属镇江市丹徒区高桥镇)、南新洲(今属扬中市)、小沙湾河(未考证)一带，也有迁苏州、靖江等地的。《开沙李氏宗谱》记有“三田”李氏迁徙开沙的宗族，此李正是唐宣宗第九子昭王洵后裔之一，其中包含丹徒开沙始迁祖。迁徙情况符合“三田李氏”总谱迁徙源流考。开沙李氏(江苏丹徒)后裔兴旺的记述，也谈到了“三田李氏”迁徙镇江京口、丹徒开沙的略事。

扬州广陵书社出版的《话说李氏·李氏源流记》中说：“宋代社有安徽迁来的一支，此李系唐宣宗第九子昭王洵的后裔”。以一始祖凤公宋时迁至开沙的李氏宗族正是昭王洵季子(京公)的后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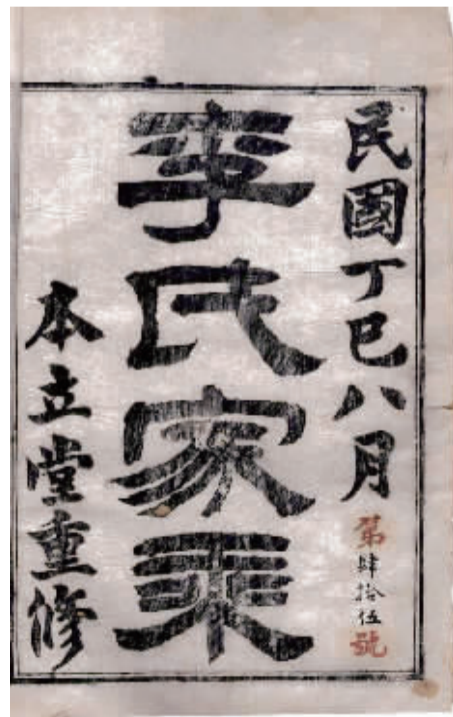
丹徒李氏系李氏昭王洵后裔

要找到散落各地的同祖宗亲，必须寻到始祖凤公同胞兄弟姐妹，才能彻底证实以凤公为始祖的丹徒李氏是唐宣宗第九子昭王洵的迁徙后裔。

2017年5月，在浮梁县县国土局退休公务员“三田”李氏39世李胜良家中，笔者见到了乾隆三十六年续修的“三田”李氏宗谱总谱五卷。此谱始祖为伴，字伯柔，改名京，宗谱至宋，历时四百余年。宋室南渡后，李氏皇室后裔中迁徙至江苏镇江开沙的这支李氏族人，因前族事株连，自明始另立族谱五百余年，建祠三百余年。为考证支始祖凤，是否是从昭王洵后裔“三田”李氏中一支分离而出，至关重要。在“三田”李氏宗谱第20世系中找到了凤，还有凤10多位兄弟及堂兄弟的文字记载。这充分说明当年凤及其他同辈兄弟、堂兄弟因受族事株连后同时迁徙外地的，李氏再修谱时，迁出的宗系已不在谱中记录了。正是凭“三田”李氏宗谱总谱史料，丹徒李氏始祖凤公与其兄弟等世系完美对接上。同时，浮梁李氏后裔提供的李氏《家世源流》《南徙事略》等家谱史料，也与丹徒李氏源流史料对

接一致，完全可以认定丹徒李氏支祖凤公与“三田”李氏同祖同宗的源流踪迹。

黔县史志办提供的《古黔风物辑存》文史一书，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千年古村奕村与丹徒李氏的历史渊源。该村地处黄山市黟县西北部山区，南宋绍兴年间，李氏祖先奕公为避黄巢战乱移徙群山深处，以李姓聚族而居，故又名李村。笔者从这里寻到了“三田”李氏源头史料。奕村李姓望出陇西，是“三田”李氏长子德鹏的后裔。奕村的《三田李氏宗谱》关于始祖京公迁徙、世系记载与浮梁《三田李氏宗谱总谱》一致，也与丹徒李氏迁徙史息息相关。



丹徒李氏家乘

